

寫字年代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

向陽

目錄

序 墨痕深處，溫潤長在

006

園丁的叮嚀

齊邦媛與國家文學館

014

慈悲喜捨的樹

聶華苓與IWP（國際寫作計畫）

020

田園躬耕的隱者

陳冠學與《自立》副刊

029

建構臺灣主體論述的史家

葉石濤與《臺灣文學史綱》

036

臺灣文壇的老園丁

——中秋夜懷楊逵

047

哀傷之禽鳥

——商禽詩〈木棉花〉的原始版本

056

在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口

——陳芳明的「陳嘉農」年代

065

咏唱臺灣庶民心聲的歌者

——王禎和及其〈人生歌王〉

073

臺灣文學史的墾拓者

——黃得時及其臺灣文學論述

082

定型新詩的倡議者

——周策縱及其「棄園」詩情

093

「醬缸」文化的批判者

——柏楊與〈醜陋的中國人〉

103

「孤獨國」詩人

116

——周夢蝶的雪與火

臺灣的心窗

128

——王昶雄及其〈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臺灣文學明燈

140

——鍾肇政與《臺灣文藝》

為母土而書寫

153

——阿盛與「散文阿盛」

啞啞的能言鳥

164

——龍瑛宗的書寫語境

鄉里人物的刻繪者

178

——追憶洪醒夫

亞細亞文學交流的推手

191

——陳千武與《亞洲現代詩集》

文學傳播的掌舵者

——蔡文甫與九歌出版社

203

臺灣農民的守護者

——吳晟及其詩文

214

臺灣客語文學的女人樹

——杜潘芳格及其客語詩

225

臺灣現代詩壇的「行動派」

——張默與年度詩選

235

把草原上的月光寫入詩中

——側寫席慕蓉

247

美麗島的玉蘭花

——陳秀喜的人生與詩作

258

序

墨痕深處，溫潤長在

那是一個變動的年代，也是一個美好的年代。

變動，來自快速蛻變的社會，一切都轉動不居。往往一早醒來，就有新的事件發生，可能是街頭上的政治衝突，可能是股市中的行情起落，也可能是重大政策的一夕逆轉……，彷彿疾雨狂風之驟至，讓人無法預測，也好似黎明來前的昏濛，使人心生不安。林義雄宅血案、陳文成事件、李師科搶案、豐原高中禮堂倒塌、螢橋國小發生學童遭潑灑硫酸、海山煤山礦災、江南事件、韋恩颱風三襲臺灣、蔣經國逝世、五二〇農民上街、鄭南榕自焚……，那是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發生之際都令人措手不及的年代。

美好，伴隨著變動而生。那個年代臺灣的經濟大幅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股票首度突破萬點；中產階級崛起，社會新興力量如雨後春筍勃然而發，民進黨成立，兩黨政治展開；政府解除戒嚴、開放探親、解除報禁，加速了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進程。一切都在混亂之中逐步找到出口，在變動之中復歸穩定，人們的臉上，洋溢著自信而幸福的笑容。

那是一個知道昨天做錯了什麼，今天得改變些什麼，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年代。

那個年代，是一九八〇年代，人們告別鐵蒺藜，迎向新莊園，終於從啞啞難言進入嶄新的眾聲喧譁的年代。

那個年代，也是一個寫字的年代，一個文學書寫、出版與傳播達到最高峰、最鼎盛的年代。文壇上老將佳作頻出、新秀衝力十足，猶如百花競放的文學花園，聞得花香、聽得鳥鳴；純文學、大地、爾雅、洪範、九歌等五家出版社（習稱「五小」）的文學書籍在這個年代席捲出版市場，每出一書，多能感動人心，為讀者珍藏；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聯合副刊（習稱「兩報副刊」）為首的三十餘家報紙副刊引領風騷，每有佳作，必受矚目，而副刊之間的議題設定與競爭，往往也隨即引發社會討論，形成可以呼風、可以喚雨的文化風潮。

那個年代，個人電腦才剛起步，尚未普及，作家依然使用稿紙寫稿，書籍和報紙副刊依然採用鉛字排版，「寫字」就是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作家發表創作的唯一途徑：他們在稿紙字格中，一字一字植入文思，一句一句填進想像，就像農夫插秧播種，他們耕作於稿紙的隴畝之中，用筆桿寫出了那個年代人們的共同經驗，也耕耘出了臺灣文學的繁花勝景。

那個年代稱寫作為「筆耕」、為「墨耘」，此之謂也。稱這樣的年代為「寫字年代」，誰曰不宜？

那個年代，真是一個美好的年代。通過作家手寫於稿紙上的字，不但留存了如見其人的墨痕，容我們透過猶留餘溫的墨痕，想像他們筆耕的神情；也鑑照了已然難再的美好時光，容我們品其字跡、咀其英華，重見他們當年悠游跌宕於文學志業的胸懷。

那個寫字年代，以長存於墨痕中的恆溫，熨貼我們習於敲打鍵盤而逐漸消失的柔軟的心；也以一勾一勒、或正或草的無聲形跡，召喚我們習於聲色喧譁而日漸萎縮的想像。

這本書，就是那個已然逝去的寫字年代的展示廳，它展示了二十四位臺灣作家寫於一九八〇年代的手稿，再現了當時的臺灣文壇場域和具體而微的象徵資本。二十四位作家的手稿，或是紙稿，或為信箋，或以明信片、賀卡方式書寫，都自然呈現了各自獨特的字跡與風格。二十四位作家的手稿，如二十四節氣之交替，風華具現；其神采，也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所示，有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麗、自然……等不同境界的呈顯。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本書也是那個寫字年代的貯藏間，它貯藏了二十四則一九八〇年代的臺灣文壇軼聞與故事，勾勒了那個年代的部分文風和習癖。在因緣際會下，以二十四位作家與一個副刊主編的文字往來為經，以作家手稿內容為緯，通過主編的回憶，交織出二十四幅臺灣文壇畫面，也點描了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文學傳播的二十四張圖式。

二十四則故事，如跨越一條河流的二十四座橋，後為隱隱青山、前是迢迢綠水，帶出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文壇相惜相攜的溫情暖意。

寫字年代，儘管泛黃了，墨痕深處，溫潤長在；手稿故事，雖只是一個副刊主編的回憶，因緣所繫，也可略窺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文壇於一二。



收在本書中的作家手稿及其故事，也隱藏著我對二十四位作家的感念和敬意。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應自立晚報社之聘，擔任副刊主編，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轉任報社總編輯止，計有五年半是在副刊編輯檯工作。當時的《自立晚報》還是侷限於臺北市區的小報，報社戮力革新，除了新聞版正刊大力鼎革之外，也希望副刊能在兩報副刊之外別樹風格，展現特色。當時我還年輕，銜命主持副刊，衝勁十足，於是以「本土的・現實的・生活的」做為《自立》副刊的定位，藉以區辨於人間副刊和《聯合》副刊的走向。

在五年半的副刊編輯生涯中，我從專題企畫、廣泛約稿和精選來稿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副刊的作家人脈，也與一九八〇年代活躍的前輩作家和青年作家有了比較頻繁的接觸。當時還是小報副刊主編的我，以初生之犢之勇，即使不時遭到婉拒，仍想盡辦法向兩報的名家邀稿，一而再、再而三努力的結果，終能獲得名家賜稿；其次，我也以策劃各種專

題、專欄的方式，廣邀不同世代作家寫稿，也擴充了副刊筆陣，使得副刊稿源源不斷，作家陣容多樣化；第三，當時仍在戒嚴年代，言論受到控制，而自立晚報因其獨立經營，加上發行人吳三連係臺籍政治大老，言論尺度較兩報為寬，我乃以此一優勢，邀部分敢言名家為副刊撰寫兩報無法刊登的作品，或者接受兩報因政治尺度退稿的名家之作——三管齊下，終於在兩報副刊之外建立了《自立》副刊的獨特性。

收在本書中的二十四位作家，就是在這一個過程當中與《自立》副刊結緣的作家。無論省籍、背景、世代或身分，他們在我的副刊主編生涯與記憶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部分大家也以他們的人格、文格，啟發我的人生理念與自我期許。我留存他們的文稿、書函，乃至明信片、賀卡，視為珍貴的禮物，從當年黑髮到今日白髮，即使部分信稿曾因水患、或因時光而致風化水漬，仍想盡辦法保留下來。二十四位作家的手稿，於我已是生命與記憶的印記。這是本書之所以得以寫出的原因之一。

我感念這二十四位多數是前輩、少數是同輩的作家，因為他們以他們的文稿和人格啟發我，而不只是因為他們與我的翰墨因緣。因此，寫下他們的風範，彰顯他們的人格，來表記我對他們的感謝與敬意，這也是我寫作本書的重要動力。

我難忘齊邦媛教授為成立國家文學館所做的獅子吼，她給我的信，堅定、莊嚴而又和煦、溫暖；我感念親自寫信邀請我到IWP（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聶華苓大姊，她對於與她年輕時同樣編輯具有反對色彩刊物的我的關照一如慈母，總是那麼寬容而明

亮；我懷念詩人商禽引介我進入《時報周刊》與他共事，其後又以他的詩作榮耀我編的詩刊、副刊的過往；我感謝學者、詩人周策縱對我從事十行詩創作的鼓勵與期勉；我不敢或忘曾經也是《自立》副刊主編的柏楊在我主編《自立》副刊之後對我的種種提攜和教誨；還有「孤獨國」詩人周夢蝶對我以及陽光小集這一群戰後代詩人的勉勵，他的淡泊、平靜，曾震撼年輕激進的我們；我也感念小說家、出版家蔡文甫在我初進文壇之際的提攜；敬佩詩人、編輯家張默對詩壇的無私奉獻，以及對年輕詩人的大力培植——這些被稱為「外省籍」的前輩作家，在我的寫字時代，以他們的文稿、書信和身教，讓我看到文學書寫的澄明，一如月光照水，清澈無私，而同時又溫煦動人。

我也懷念在戒嚴年代中與自立晚報同樣位居邊陲的前行代省籍作家：田園作家陳冠學以他的臺語研究專欄和小品書寫，讓《自立》副刊的本土走向明晰而精實；小說家葉石濤與鍾肇政兩人長年供稿給稿費甚低的《自立》，創作、翻譯與論述，無一不齊，他們對臺灣文學的堅持和香火傳遞，更是教我動容；小說家王禎和身罹癌症仍為《自立》寫稿譯稿，總是不時給我信函的謙和，也讓我不捨；日治年代就已成名家的楊逵、黃得時、王昶雄、龍瑛宗、陳千武，以及戰後出發的陳秀喜、杜潘芳格……等多位「跨越語言年代」的前輩作家，無論供稿或在我與他們親炙的過程中，展現出的雍容、寬闊和智慧，都讓我沉吟至今，仍在學習——這一群用他們一生的書寫和實踐，護守臺灣文學的老園丁，即使身處當時的文壇邊陲，仍然勁健如昔，不為環境和挫折所屈。在他們的文稿、書信和身教

中，讓我充分體會到他們對臺灣的愛與堅持，一如蒼松，一貫挺直腰桿，蒼然無懼。

在幾位長我幾歲，也可說是同輩的作家中，英年早逝的洪醒夫，在文學、歷史與政治交叉口上奮進的陳芳明，以書寫和實踐守護臺灣農民的吳晟，寫出臺灣城鄉特質的阿盛，把蒙古草原上的月光寫入詩中的席慕蓉……，都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就與我相識的亦師亦友作家。我讀他們的信稿，知道文學路上並不寂寞；讀他們作品，砥礪自己繼續前進。我們曾經通過一九八〇年代的副刊，互相疼惜，互相鼓勵。

所以，本書也是我的生命史的表白，我寫下存在於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學經歷、師友因緣，以及這二十四位曾經影響我、啟發我、鼓舞我的作家的故事，從中反省迄今為止我仍遠不及於他們之處，藉以自省自惕。希望這些故事，或多或少也能提供給讀者一些啟發和鼓舞。

整個一九八〇年代，與我有文字因緣的臺灣作家，讓我感念、尊敬的作家當然不止於本書記述的二十四位，恪於書頁篇幅，未能一一記述，只好容他日另有機緣再補了。

本書之成，要感謝《文訊》雜誌總編輯封德屏，提供寶貴篇幅，容我每月叨絮，從二〇一一年六月到二〇一三年四月，從第三〇八期到三三〇期，總計連載了一年又十一個

月，順利刊登二十三篇（另一篇〈為母土而書寫——阿盛與「散文阿盛」〉則屬南一書局邀約之稿，未刊《文訊》）；撰寫期間，該刊副總編輯杜秀卿、企畫主編邱怡瑄經常包容我的拖遲交稿，都讓我得以放手書寫，終能成書。

本書之出，則要感謝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先生，從我年輕時踏入文壇，他就相當關懷我的書寫，約我書稿，讓我的重要詩集《十行集》出版迄今近三十年仍能在書市中被看到；感謝總編輯陳素芳、編輯陳逸華為此書費心費力，讓本書得以問世。

最後要感謝你，親愛的讀者。感謝你打開這本書，隨我進入一九八〇年代的時光走廊，閱讀二十四位臺灣作家的手稿，聆聽這些作家與我的故事！

何陽

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清晨鳥鳴聲中，暖暖

園丁的叮嚀

——齊邦媛與國家文學館

旅美多年的小說家聶華苓先生於五月返臺，參加「百年文學新趨勢——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致敬」系列活動。文訊為舉辦相關展覽，要我提供當年參加國際寫作計畫的照片和資料。我翻箱倒櫃，終於找到一些。光陰不僅似水，也如日與月之相推，青春會逝去，但記憶永留存，依靠的，就是當年可能不以為意，隨手擺置的斷簡殘篇，銘記歲月，甚或標記了某種因緣——文訊編輯一通電話，攪動了我的書房，也掀開了書房中塵封已久的書信，泛黃、風漬，部分已見破損，我的文壇因緣，被鉤鈞而出，漂流在時光之海的瓶中，越過世紀，來到我的眼前。

在這批為數不少的殘篇中，首先映入我眼中的，是齊邦媛教授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給我的一封信。這封信寫在拍紙簿上，撕下紙頁後再傳真出來。齊教授娟秀而又流露出大氣的筆跡，一字一字由左往右推進，彷彿秧苗，逐一播種在整齊的藍格線中，蔚成一畝字田。發現這封久尋不獲的信，使我備感驚喜。揣想齊教授當年寫信的心

情，每一段落，都是叮嚀，提點後輩晚生，要為臺灣文學下田耕作。

信的內容，已見於齊教授的回憶錄《巨流河》第十章〈鼓吹設立臺灣文學館〉之中。齊教授起筆就說，「國家文學館之設立，是我以個人微薄的力量，向政府文化政策所作的最後一個挑戰」，接著回憶她催生國家文學館的歷程。其中她在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茶會上的慷慨陳詞，最使在場賓客動容，媒體也因之以醒目標題發布新聞。我當時在場，對齊教授如此作獅子吼，更是肅然敬慕。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法院為此召開公聽會，齊教授的傳真信就是在公聽會前夕傳給我。可以想見當晚她是多麼急切，國家文學館是她的夢，是她對臺灣文學的瞻矚。因此她要我「以詩人的Vision」呼應她勾勒出的國家文學館意象：

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穹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著它的是臺灣的文學成績與現況，世界的文學成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

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啟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我收到傳真時，年末冬夜，暖暖山居濕寒，心裡卻溫熱異常。齊教授早從一九七〇年代

林淇濇先生

十二月廿八日，'98

向陽兄：

請原諒我晚上傳真說幾句明天有關“國家文學館”聯誼會的我見。剛在你赴會前看到，我為它已發言不少，但從昨你們以詩人的 Vision 代我表達一些中心意象：

當人們說到“文學殿堂”的時候，有時會有嘲諷之意，但想到文學館，我認為它在教化的功能上應有殿堂的莊嚴涵義。（所以不宜有別的實用工作組織擠掛一張牌子而已）

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穹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着它的是台灣的文學成績與現況，世界的文學成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

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啟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這樣具有象徵意象的館，也許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但是往長遠想，我們應該先說明或描繪一個真正的理想，也許政府，乃至私人捐募可以有日建出一個有尊嚴獨立的國家文學館，遠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現在的文建會林主委已盡心盡力在獨立設館的爭取，則大家共築遠景！

謝以你肯以此數行作個參考。中午見。

齊邦媛拜啟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向陽與齊邦媛先生合影於「巨流河朗讀會」。（應鳳凰攝）

起，就為臺灣新文學作品編入教科書、為現代文學創作外譯等大事費心費力；此外，她也長期擔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義工顧問、總編輯，以「我們臺灣」的心將臺灣文學推向世界文壇，到此際還要為催生臺灣文學的「家」奮鬥，以垂顧之心期許後生晚輩——我羞愧有之，更覺熱血沸騰。

事實上，在齊教授傳這封信之前，十二月七日，我已於《自由時報》副刊發表〈打造臺灣文學新故鄉：呼應齊邦媛教授設置「國家文學館」之議〉一文，呼籲臺灣文學工作者採取做為，全面而廣泛地向有權者施壓，直到國家文學館設立完成為止。文末我如此勾繪心目中的國家文學館：